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研究综述

夏 激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传统的华文教育研究主要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 探讨海外华人文化传播中华文教育所发挥的作用; 或者研究华文教育的教学形式、手段和实用性, 被当作单纯技术性的“汉语语言教学”。随着全球化互联互通, 内外交流日益紧密, 华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海内外影响力不断增强, 研究的视域和难度不断提升。

关键词: 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 中华文化; 传播

语言与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华文教育不仅被誉为中华民族海外“留根工程”, 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希望工程”。其中, 马来西亚作为唯一一个除中国外拥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且华文教育从未中断过的国家, 更是具有研究的典范性。在“汉语热”的大背景下,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已迈入了历史的快速发展期。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马来西亚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更是为其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愿景。

“华文教育”完整名称最早见于20世纪50年代的马来亚联邦, 关于其具体定义, 学界虽还未有统一的说法, 但大都围绕着“海外华侨华人”“中国语言文化”“教育”三大基本要素, 也就是说, 华文教育具有文化传承功能。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之所以始终坚持华文教育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持自身文化特性, 保留中华文化的根。虽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曾经经历了一段波折期, 但华文教育的薪火却一直在相传中。有关中华文化传播与华文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断涌现。

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史和中华文化传播研究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始于近代, 至今约有200年的历史。学者们利用报刊、会馆资料等文献, 以时间为纵轴, 以此梳理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历程, 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丰富。如董教总《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1991年)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简史》(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1992年)及其增订版、谭家健《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民主2004年)等。其中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研究较为全面的是郑树良先生。他在新世纪交接之际相继出版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四册)(马来西亚教师会总会出版1998年, 1999年, 2001年, 2003年), 后又在此基础上出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他在书中详细的介绍并总结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 同时附有丰富的史料图片。纵观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史研究, 大多将其分为私塾期, 自由期、殖民期、危机期、衰落期和复兴期六个阶段。这一时期, 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也基本呈现出相同的趋势。从研究成果看, 几乎都有提及华文教育对中华文化的传承的作用。在《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年)中, 何国忠就以独立为分界线, 讨论了不同年代的华人文化思想特色, 以及为了文化的传承与建设, 马来西亚华人在教育领域做出了诸多努力, 如确保华小不变质、发展独中、申办独大等, 认为没有华教就没有华族和华族文化。除此之外,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2002年)、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2000年)等都有体现这一观点。莫顺生从微观和宏观的视角对1400-1999年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史进行了梳理, 同

时探讨了各教育领域的起源、发展及演变过程。Ang Ming Chee的《Institu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in Malaysia, 1951-2011》(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cademic Journal, 2015)被称之为最全面地论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英文专著。但因此专著研究华文教育的时间为1951-2011年间, 遗憾的是并未探2012年马来西亚政府发布的重要教育报告“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3-2025) (马来西亚教育蓝图)”方面的内容。林宝卿、刘世勇、王焕芝、吴建平等则聚焦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探讨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等对华文教育的影响, 并预测及展望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以上文献时间跨度较大, 史料较为充分, 可以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的史料和背景资料使用。

李开慧在其论文《简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中不仅回顾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诞生与发展历史, 还追溯了华文教育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原因, 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此相同的还有耿卫红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简论》(《船山学刊》2007年), 他在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进行梳理后, 认为华侨华人在马来西亚创办华文教育的历史, 是一部血与泪写成的斗争的历史, 体现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可以说, 华人华侨教育抗争史就是中华文化坚守与传承的历史, 华文教育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文化的传递和发扬寄托在华文教育的继续发展上。

二、马来西亚华校及教学相关要素和中华文化传播研究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凭借其教育体系完整性在世界华文教育中占独特地位。华文学校是培养学生中华文化素养的重要场所, 同时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传播新思潮的有效媒介。华校与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重要精神家园, 是中华文化传播重要平台。学者们较多的以中学华文教育作为研究对象, 而关于小学和大学的华文教育研究较少, 基本呈现出中间多两头少的状态。当然也有学者从中小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传播。徐云彪《从小学华文教育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传承》(《教师教育学报》2018年)从小学华文教育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传承, 他认为可通过华文小学的课程内容窥探一二, 提出华文小学的华文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庄慧琳的《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价值观教育》(《中学语文教学》2020年)一文从中学华文教育视角看中华文化价值观教育, 她认为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和独立中学在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时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前者兼顾学生个人品格修养和社会意识培养, 强调团结互助精神, 并将其延伸至国家层面, 体现马来西亚政府对国民意识及爱国精神的培养; 后者则倾向关注学生个人修养, 尤其强调良好学习态度的

培养,强调华人对华文教育、学习华文、传承族群文化的重视。郑瑞玉也从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切入,探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教育的发展,并以此为背景,对当代教育和民族文化崛起进行一个深入探讨。

另外,有关教材和教学法文化层面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华文教育研究的焦点。关于教材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教材在展现中华文化的同时还应体现出本土文化特色,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地教学,便于学生接受。有学者以华文教材文化词汇为切入点,主要运用计量方法,以中华文化词汇和本土词汇为考察点,对马来西亚华文课本中的词汇进行统计分析。提出在当前的汉语国际推广中,汉语教材应体现本土文化特色,以免教材出现“水土不服”问题。宋婧婧《马来西亚独中教材〈华文〉:文化传承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和侯显佳《马来西亚董教总版初中〈华文〉与人教版初中〈语文〉范文系统的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都从马来西亚独中教材《华文》入手,前者对教材中“古文阅读训练”与“听说训练”部分进行分析。并参照了同为母语教材的我国大陆《语文》课本以及港台语文教材的编纂情况作比较,认为教材编者从本国的教育背景与语言的性质出发,坚持了文化传承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而后者则通过范文系统考察,认为董教版更具语言学学科的工具性,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选材上略有不足。吴妮妮《论汉文化词语在马来西亚对外汉语教材中的应用》(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从汉语文化词角度,分析马来西亚高校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堂的教材情况,找出教材中文化词语编写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使用教材的教师进行访谈,最终总结出对外汉语教材文化词语的编写和教学方面的建议,以期寻求一个融合中国文化和适合马来西亚本土传播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方向。

三、华侨华人视角下的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研究

纵观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百年发展史,华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华人和社团的努力和奋斗。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抗争,才让马来西亚成为了除中国以外唯一拥有从小学到大专的完整的教育体系的国家,才使得中华文化得已完好传承至今,在这个领域他们功不可没。例如张卫东《论叶氏宗祠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事业的贡献》(《深圳大学学报》1997年)、陈徽治《潮籍华人对马来西亚教育文化事业之贡献》(《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这两篇文章分别以叶氏宗祠和潮籍华人为研究对象。前者对华教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支持创办独立大学以完善华文教育体系;支持华文独立中学复兴运动;参与推广华语运动,支持华校以母语为教学媒介的立场。后者则没有将华文教育列为唯一的主题,而是从宏观的角度全面阐述了潮籍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领域、教育和文化出版方面作出的贡献。张继焦《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企业家的作用》(《民族教育研究》2015年)以华人社团和企业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华人自救自强的公共事业,而拥有财力的企业家和商人就是“教育代言人”和“文化守护人”。而在《华人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助学贷款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一文中,他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为研究对象,研究华人社团通过设立相应机构,制定奖助资金相关的规章制度等,来保障奖贷助学金的顺利颁发,加强对奖贷助学金的管理。指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设立并颁发奖贷助学金对华文教育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部分学者从南洋大学的创立、独立大学的申办以及对“单元语文政策”的抗争的角度,展现华人社会为华文教育的发展所作出的

努力和贡献。这方面的学者有何敏波、周聿峨等。Collins 则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董教总为争取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努力,同时他指出董教总取得有限成绩是由于其在马来西亚缺乏合法性,同时未能与华人社团保持一致步调,因此未能等到很好的发展。

四、文化认同等新视角下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研究

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大势不可阻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华文教育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华文教育研究的参与机构和参与程度也得到进一步完善。近年来,新理论视角下的华文教育研究成果有所丰富。华裔族群因其特殊成长环境,呈现出对中华文化认同代际弱化的趋势。有学者就以此为视角来阐述中华文化传播与华文教育的关系。刘以榕的《马来西亚华族的文化适应与华文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认为马华文化建设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本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关系,丰富内涵、兼容并蓄、不断创新。华文教育的文化适应互动性比较明显,将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适应与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沈玲《东南亚新生代华裔文化认同的国别比较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17年)通过对马来西亚等国新生代华裔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华裔的国家认同总体倾向于居住国,他们的族群融合意识在进一步增强,在居住国的社会融合程度日益提高。通过国别比较发现,马来西亚等国新生代华裔在中华文化认同方面各有特点,他们对祖籍国有一定的亲近之情,但其中中华文化认同总体有减弱趋势,这使得其中华文化的代际传承与传播面临危机。这也是目前华社大力推广华文教育的原因之一。还有学者从多元文化背景的角度出发,认为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继承本民族语言文化、维护民族权益、提高民族素质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主要途径。应不断总结办学经验,建立健全领导组织机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就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直接或间接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论著较多,有关于中华文化传播的阐述也多是在此基础上但着墨不多。关于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的关系解读也较为含糊,多只是简单论述华文教育具有文化传播功能,关于两者关系没有进行深入挖掘。还有从华文教育的抗争角度来进行讨论,将华侨华人争取华文教育合法权益看作是维护中华文化的一种手段,但没有具体论述华文教育的不同时期的发展会对中华文化传播造成怎样的影响。而且从搜集到的资料可以发现,目前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虽然非常多,但缺陷是大多是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资料,而对于21世纪最新的资料较少。

参考文献:

- [1] 周聿峨. 东南亚华文教育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05.
- [2] 何国忠.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全三册) [M].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8.02.
- [3] 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全四册) [M].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998.
- [4] 莫顺生. 马来西亚教育史(1400—1999) [M].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2000.
- [5] 柯嘉逊. 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 [M]. 董教总教育中心, 2002.
- [6] 李灵窗著. 马来西亚华人延伸、独有及融合的中华文化 [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4.